

刘雁翔 著

杜甫秦州诗别解

刘雁翔题



甘肃教育出版社

刘雁翔 著

杜甫秦州诗别解

刘雁翔题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秦州诗别解 / 刘雁翔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423-2885-4

I. ①杜… II. ①刘… III. ①杜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8115 号

封面题字:王岳川
责任编辑:王文琴
封面设计:郑屹

杜甫秦州诗别解

刘雁翔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75 插页 3 字数 500 千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978-7-5423-2885-4 定价:5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谈杜甫的秦州诗（代序）

赵丽生

杜甫留给我们的遗产，实在是太丰富了。如分题钻研，有好多分支值得探索。就拿组诗来说，在他三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随着生活地域和环境的改变、心情的不同，自然形成许多的组诗，有时作者本人有意识地给它们一个总题，把它们串连成为明显的一组；有时也任其散落地独立存在着。更有时，一组诗也会跨越几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和生活地域。这些组诗，一个个鲜明地表征了杜甫风格和技巧上的变化重重，给后代诗人留下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影响。他的秦州诗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杜甫在他48岁的这年，因生活所迫，逾越陇坂住到秦州（天水）和同谷（成县，唐为成州治）来。来时正是“高秋”，去川时已是腊月，居停了不到半年时间给我们留下了120首的诗篇。这些诗，我权且把它们叫做“秦州诗”吧（成州在军管系统上也从属于秦州的）。我认为，这120首诗足以代表杜甫创作生涯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因为在这一大组诗中著录了诗人前所未有过的某些心情，展现了诗人以前不太使用的某些技法。也就是说，在这一大组诗中我们的诗人在他过去一贯的典型风格之外，又复尝试了新风格的塑造。这些塑造新风格的尝试，自从去蜀以来虽然仍有所延续，但跟在蜀的诗毕竟又有所不同。在这些诗中，似乎又可以划出四个小组的组诗来：（一）秦州杂诗20首；（二）秦州去同谷的旅途即景诗12首；（三）同谷七歌；（四）在秦、同居



停期间用短小篇什即景咏物之诗,约有十四五首。这些诗对汉魏六朝诗的遗产有了新的继承,诗人本人风格有了新的创造和尝试,对以后的晚唐诗和宋诗带来了许多的影响。现在,结合具体篇什来具体分析一下。

我们从许多征象上可以看出,诗人这一阶段的生活几乎是最艰苦的,心情几乎是最沉重的,社会关系和环境条件几乎是最落寞的。这里既没有长安生活中一些诗酒、倡酬、观画、观舞、听歌的机会,也缺乏像东都、弘农人口密集地区那样多那样典型的社会事件,连蜀中的一些杜鹃、花鸭、桤木、芙蓉等等的景色也是不多的。他所看到的是“土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如“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等。虽然有时也出外登山临水,但经常的生活是仅仅希望做到“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就好了。在杂诗20首里有这样一首: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万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

这是一片极其肃穆的境界,和寂寞而又顽强坚持诗人一贯态度(“吾道”)并不动摇的心情。寒蝉、归鸟两句,没有这么一种心情的贯注,是写不到这么精严的。这是说,让那些跟在肃宗手下新近收复了京师的文武官僚们胡干去吧,他们腐朽到连个邛城都拿不下来,或早或迟他们会受到人民惩罚的,从表面上看似乎他们是主流(“同一概”),而诗人爱国忧民的一番忠贞似乎是无容身之地似的(“竟何之”);其实则不然,诗人坚信坚守这一点,才有了“寒蝉归鸟”等的宣誓。这里不仅有技法上的精练,更重要的是诗人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精练的根源,他的思想和信念,他的信守和忠贞。这些,在经历了更艰苦的生活考验下,不是动摇而是更顽强了。我这样说的根据是,在杂诗20首中诗人处处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如“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那堪往来成,恨解邛城围”、“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西戎外甥国,何得忤天威”、“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等等,最终诗



人将自己比做一匹衰老的战马“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骍骠，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寒蝉的静、归鸟的迟，骍骠的哀鸣，它在苍苍中的迥立，既是客观景物的描写，又是作者主观世界的揭露。试看这些意志和情感，是多么地积极悲壮，谁能说这是颓废和衰洒的呢？

杜甫在天水住了约摸三个月，虽然也曾自慰地说：“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但生活上究竟是维持不下去了，在《发秦州》诗中他记录下了南赴同谷的动机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在偏南些的徽、成地区中，十月天气还如凉秋一样，草木未黄落，山水清幽，有良田畴，并且“充肠多薯蕷，崖蜜亦易求”。所以诗人决心“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在这首诗的结句中，诗人又一次绝非偶然地提及“吾道长悠悠”。足见每到生活考验的重大关头，我们的诗人总是要拿出自己的信守和忠贞来重新坚定一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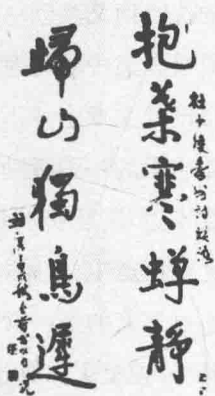


图1 赵儒生《秦州杂诗》书法条幅

在到同谷后不久，他就写出了代表他自己写作顶峰之一的“同谷七歌”。为篇幅所限，这里只引4首于下：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铗长铗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脛。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风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孤立。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夙昔伤怀抱。呜呼七歌



吟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反复咀嚼这一组诗的内容，实在感到是太丰富了。这中间有诗人过去一贯的本色，又有非本色的别格；有一贯的忠贞，也有艰苦环境下特具的苍凉激越。正由于这种关系，历来谈论这组诗的人也就更集中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宋朝的朱熹说他集中了九歌、四愁、十八拍的优点而又独创一体。清初诗派首领申涵光（鳧盟）也说它顿挫淋漓，应是全集中的得意之作。明后期的东林领袖和杂剧作家赵南星更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提及拾橡栗的一段情节，作为对他自己绝不向阉党屈服的一种激励。自内容说，我们从这里十分形象地看见白头诗人乱发过耳，手持长镰，短衣挽起，手脚皴裂，当日暮天寒雪盛之时，饥走荒山道中，或拾橡栗，或掘黄精，野外所见不过狐狸跳梁，归来所闻不过邻家的男呻女吟而已。但诗人于“万感交集”和“伤怀抱”之余却是“仰视皇天白日速”，这是何等的顽强劲儿。从技法看，杜甫一般的特色是“稳”，少见李太白“蜀道难”式跌宕的气势；但在这组诗中他再也按捺不住寒蝉般的静谧了，充沛地迸发出了歌行体长短句的萧萧滚滚之姿。此外，从“溪水急”、“枯树湿”、“黄蒿古城”以及“白狐跳梁黄孤立”，甚至像押“死”、“速”诸字韵脚的这些用字遣句之中，既可见出杜甫的创格，又是他对楚辞九歌、招魂以及古诗“枯鱼过可泣”、“千岁髑髅生齿牙”等既厉且艳诗句的紧密继承，又晚唐诗人譬如说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归自会稽”诸歌的创作，显然是给予了他极大的启发。一想到这里，真感到杜甫在诗史上确实是达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地步。

“同谷七歌”里的这些特色，也散见于他同时所作自秦州去同谷沿途即景的12首诗中。在这一组旅途诗里，诗人显得情感多面、技法多样，这里有个人的经历和心境，有生民疾苦，有写景如画，也有七歌中的激励。譬如在“同谷”一首里他写了“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从而产生了“重来未有期”、“常恐死道路”以及“迫此短景色”的一连串想法，这也是一个老人历遭艰苦后所不可



避免的现象。这跟他以后到蜀所见杜鹃就拜,不能拜就哭的情态是一类。在《法镜寺》一首里他又画出了一幅恬静的风景画,“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真要叫读者叹如身历了!在又一首题作《盐井》的诗里,他用了单一的叙事体刻画了煮盐的情况,并指出“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的私营盐利重于官盐一倍的剥削实额。在《泥功山》一首里他写出了“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那种青泥陷人的危境,并殷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其中我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石龕》一首:

熊黑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猱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驱车石龕下,仲冬见虹霓。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

杜甫在技法上是肯于大胆创造的,譬如像这首诗的开始四句,就别致地使用了汉乐府歌词中古拙层叠的起法,七年后他在四川咏杜鹃时也有过“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这样的类似笔法,这实在是把古诗“鱼戏莲叶”东西南北的技法做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在情感感染方面,它又是曹孟德《苦寒行》式的。但曹氏《苦寒行》的气氛主要是写实,而杜甫笔下的熊、黑、虎、鬼、猱,则是使用浪漫主义手法,讨伐当时的贪官酷吏骄兵悍将,具有更现实的社会意义。接着,诗人又引导我们接触了“路迷”和“虹霓”等具体景象,然后再转入到“三吏”、“三别”式的境界,叙述为了平息安史之乱,五年来这徽、成一带的劳动人民不惜爬上高空为国家采伐制造箭竿的直竹,直竹快要采光了,可是邛城一战官军仍不免于溃败,可见官家腐朽,不足以担负拯民于水火的责任,诗人对他们是失望的。在这一首不长的诗篇里,作者既表现了对他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社会体裁剪裁手法的持续与发展,并且也精彩地结合进自《楚辞》《九歌》《招魂》以来传统浪漫主义的生动因素,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同一首诗里得到了熨帖的结合。



假如“七歌”是秦州诗中的顶峰,杂诗和旅途即景诗是顶峰四围散落的诸峰的话,那么,另外的一些“小即景”诗就是由本组山峰向另一组山峰绵延连续的别派了。另组山峰,我的意思是指咏物诗,咏物诗和咏物词在宋诗宋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这件事具有两方面的意味,一方面它意味着宋人诗词思想内容之相对地贫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宋人对技法基本训练之更加重视,有如绘画之强调素描一般。像在唐诗中,初唐诗人是不做咏物诗的,杜甫本人前期虽也咏鹰咏马,但那都是借咏物以抒情的大歌行,不是静观式的素描。杜甫的咏物诗是自秦州时期的“小即景”诗如《初月》等篇转化而来,到居蜀时期才更经常地做,这才使咏物诗在他的全部遗产中占了一定比重。在他创作生涯的最后十年之中,他似乎总喜欢用律体或者是八句的古体来写一事物,包括昆虫、鸟兽、花草等,并且似乎是总喜欢标两字为题与酬倡诗题字累牍的情况相对照,以示别成一格。杜甫的这种创格,是自居秦州时开始的。

杜甫这些最早的咏物诗,大体上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笔触比较细,联语很着力于工整,结句处点染诗人的情感,主要是沉郁而不奔放,跟“同谷七歌”可说是同归而殊途;到四川后的咏物诗又往往再加些诙谐而轻松的情调,这是秦州时所没有的。现在,选《萤火》《除架》两首在下面,并加以分析: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慢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萤火》》

束薪已零落,瓠叶转萧疏。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无有初。《《除架》》

历来人对这两首诗也有过谈论,如不少人说《萤火》诗是“刺阉宦也”,甚至指明就是骂李辅国的,这未免有跟政治强拉硬扯之嫌,且启后代对诗猜谜的不良之端;王渔洋(士禎)说《除架》是诗人穷途末路之作,又未免把诗人的品格贬得太低了。最好不要这么解释。实际上,这是由小即景诗向咏物诗转化的开始,此时诗人屏居僻处,活动较少



而心情多静穆,于若干年来长篇巨什大笔挥洒之余,颇思别具一格,将自己爱国爱民的一片忠贞更加凝练,通过更小的篇幅和更精细的技法表达出来。诗人表示,尽管人们把我的蔓叶剪除了,那也没有什么,反正我的花已开过,瓠已结过了,人生“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结局如何,又何必斤斤计较;何况尚有秋虫暮雀的陪伴,也并不寂寞呢!这是自慰,也是坚持。他又表示,一个人即便他再怎样卑微,不敢近太阳,也不足以做囊萤之光,但仍是可以发挥他一定的作用的,点衣、隔幔、带雨、随风,又有何不可!至于最后下场如何,不必计较,随他去就是。这是一种达观而硬朗的人生态度,哪里来的穷途末路之说呢?!由此看来,杜甫在秦州的咏物诗跟他的“七歌”、“杂诗”、旅途即景诗等,从思想情调上看,是并无差别,而且是共成一贯的。在技法和风格上的各有差别,则正是老杜诗法多样化的具体表现。

总上来看,我个人认为,秦州时期在杜甫创作划阶段中,应该说是处在一个转折的地位上,即由京洛时期向草堂时期过渡。并且还要说,这个转折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虽然在这个转折时期诗人作品中社会资料的分量相对是减少了些,但诗人的政治热情仍是同样的充沛,在艰苦考验下品格更加骨硬,他的技法更精炼更凝练了,技法更多样化了,在诗的格式和风格方面也有了新的开辟和增殖。单纯从技法上说,假如京洛期是“正”,那么秦州期是“反”(不是截然的对立,而是“变格”之意),草堂和夔州期便是“合”了。这正是杜甫创作道路辩证发展的一条大线索。

附记:

赵俪生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才子式历史学家,学养深厚,课讲得好,文章写得好,研究视角广博,老本行历史而外,举凡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书画艺术等都赫然成家,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一面旗帜。我上学的那会儿,赵先生因年龄缘故,已不开本科生课程了。不过,还好,1986年赵先生为助教进修班讲授《中国综合文化史》,我们可以旁



听。赵先生好像喜欢也适合那种窗外企首、过道阻塞、人满为患、济济一堂的盛大场面，本来是开“小灶”，结果开成了“大食堂”。人都说听赵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我有幸享受过好几回，抢不上位置者除外。风度翩翩，声音洪亮，纵横古今，头头是道，赵先生尽心尽力，我们跟着陶然陶醉，享受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但我一介普通的本科生，加之腼腆，不善交际，始终无缘和赵先生私下相识。换句话说，赵先生压根儿不认识我。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先生的崇敬崇拜之情。

1998年之后，因研究《二妙轩帖》的缘故，我开始研读和帖相关的杜诗。接下来我的忘年交天水市文联主席陈冠英先生提议，由我负责《二妙轩帖》杜诗及题跋的注释，他负责收集相关图片及书画资料并排版编辑，合作编著一本集诗书画文为一体的《二妙轩帖》研究专著。谈及赵俪生先生，陈主席说他们打早就认识，还是有交情的那种认识，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请赵先生作序。在我们研究工作即将告竣之际的2001年秋，赵先生的大序来了，陈主席很兴奋，约我看序的手稿，字迹有些扭曲，可能和年事已高（85岁）、身体欠佳有关。但赵体文风依旧，娓娓道来，文采飞扬。2002年煌煌六大卷的《赵俪生文集》出版，文集收录了写给我们的那篇序，题为《〈二妙轩文集〉序》。事实上当时我们的书名还没有最终敲定，书也未问世，赵先生的文集出在了前头，也就有了《二妙轩文集》这个尚未落实的标目。最终书名由文怀沙先生题签，名《晋唐二圣劲爽千秋集》。2004年陈冠英先生突然仙逝，这个“集”也就只能停留在稿本阶段未能变成铅字。

之后，我的杜诗研究工作还在进行。注释的杜诗也由原先《二妙轩帖》所选的60首扩展到整个的秦州诗，且详证详注，想着出一本关于杜甫秦州诗的书。又想到请赵先生作序，可又听说他身体不是太好，于是请我的老师王劲先生探问，是否可拿先生的旧作《谈杜甫的秦州诗》代序。得来的结果是，先生说旧作太旧，可写新作序之。我大喜过望，也增强了注好秦州诗的信心。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呈现在先生面前以配得上他的大序。注诗工作一直在断断



续续地进行,但因杂事太多、抑或学力所限,始终是上不了进度,我想象的满意答卷也急忙提交不上去。

2007年11月27日,我所敬爱的赵先生溘然长逝,哀哉!新序是写不成了,而我的注杜工作仍旧在断断续续地进行。2011年秦州诗注终于完成,总算有了一份自认为比较满意的答卷,可答卷该交往何处呀?想到这些,不由让人黯然神伤。末了,我又请王劲先生征求赵先生公子赵缙教授意见,以继续前缘,仍旧以赵先生旧作《谈杜甫秦州诗》为代序,得到赵教授热情回应。转了一圈子又回到原地,因我的不努力,拙作少了一篇出彩的大序,文学史界少了一篇见解独到的美文。谨在此深深自责。不过,赵先生这篇1962年发表于《青海湖》第6期的旧作,满篇珠玑,其“秦州诗”的提法、对秦州诗的特点及地位的估价、杜诗的分期等多是真知灼见,对今日研究同类问题依然大有裨益。以之为序,足以光耀拙作。下面再录赵先生《〈二妙轩文集〉序》与秦州诗相关的部分(片段)一并为代序,以示对赵先生的追念。

先来说和秦州诗的因缘。大约41年前,我被打入了“另册”,工资拿掉60%,一家八口靠40%的数额过活。当时大孩子刚进大学门,二孩子高中应业毕业,三孩子上初中,四、五、六则在高小、初小或幼儿园,一开学都要缴费。有个朋友就说,“另册”是不能发文章的,你用个笔名,我拿去找刊物发表,赚点稿费,也可以补贴家用嘛。于是我就写了《谈杜甫的秦州诗》。那是1962年,距“文化大革命”只有三四年。这本来平安无事了,可是从上边吹来一股风,说这篇文章需要嗅一嗅。一到“文化大革命”,这嗅的成果就满园大字报铺开了,众口一声说这是一株大毒草。当时笔名用的是“鹿其莘”。这是取我原学名一个“姓”字的典故“姓其鹿”。“姓”读“莘”,我取的笔名,由此而来。但一位青年教师却在大会上说,“这是一套隐语,‘鹿’同‘戮’,‘莘’同‘心’,就是说共产党已经把他的心戮碎了”。看,这真是上纲上线的绝妙佳例。

其实当年那篇文章,把秦州诗并未说尽。现在老了,理解得更周全。假如杜甫的诗可以分三个时期的话,那么第一期我们叫“京洛



期”，主导风格是现实主义的，像“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第二期我们叫“秦州期”，作者的人生观有了变化，诗的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诗的主导风格渐近于浪漫主义，调子激越苍凉，像“同谷七歌”，李太白写得出来写不出来，我们还未敢必。它在三个时期中起着一种“高屋建瓴”的作用。这点作用，在那篇“毒草”中尚未发挥出来。第三期我们叫“锦城—夔州期”，作者自己说“老来渐觉诗律细”，他用字更斟酌了，用韵更完美了，写一花一草一鸟一木，带有了某些自然主义色彩。但晚年当他回忆起开元、天宝间一些名臣猛将时，秦州风格和“同谷七歌”的调子，有时还有某些复辟。

再附记：

我生性笨拙，不谙世事，好藏书，也好乱翻书，而置枕边者即是翻阅最多者，也是最喜读者，《赵俪生文集》就是我的枕边书之一，常看常新，受益良多。追念曰：一代学人，真情真文；行为世范，桃李芳芬。



自序

文章做完了,应该说是书终于做完了。书做完了理当冠之以序,而前面已经有了赵俪生先生的代序,接下来我想再来个自斟自饮式的自序,以说明些什么,解释些什么。

这本名现在叫做《杜甫秦州诗别解》的书,初稿时定名为《两可斋杜甫秦州诗臆解》,先解释一下书名转换的过程,以便因名求实。之所以有初稿那样的名字,这其中有自己的臆想的缘由。突如其来贴一个“两可斋”的“标签”,这是我的书房名,当然这个不敢和蒲松龄老先生的聊斋类比。这只能说是不能免俗的产物,大凡从文之人多要为自己的书房起个雅一些的名字,以淡泊、以明志。再者,多年以床为桌之后终于有了书房,顺便起个名字,以示珍视。何谓“两可”?简单解释就是无可无不可,复杂些说——得自明末清初陇西高士王了望《风雅堂漫语》,“漫语”有云:“琴可不弹,不可不听;棋可不高,不可不下;酒可不醉,不可不饮;□□□□(此处删去4字),不可不与。名山胜水不可不游,名人韵士不可不识,更不可不交。”王先生为人超凡脱俗,诗文也是超凡脱俗,“两可”之人生态度更是超凡脱俗,心向往之久矣。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名教授李燕杰先生,为我篆题“两可斋”,使“两可”命名书房落到实处。诗名冠之以“秦州诗”,是指注解内容为杜甫流寓秦州、南下成州时的诗作,即学术界约定俗成的“陇右诗”。为何用“秦州诗”提法而摒弃“陇右诗”提法,卖个关子——且听后面《叙论:流寓秦





州、成州的杜甫及其诗作杂谈》分解。所做工作冠之以“臆解”，是说“解”追求直出胸臆、直达真意要旨，不可避免还有因求新、求变而间或陷入臆猜者，有大异于传统训诂者。注杜名著有王嗣奭《杜臆》，有蒲起龙的《读杜心解》，前“臆”和后“心解”加起来就是我想指的“臆解”。非狂妄也，手摹心追也。谦虚一些，“臆解”则略等于乱解。对书稿这样的书名，当是时也，我是有好几分的自鸣得意。我的老师王劲先生因应承我的请求，向赵俪生先生公子赵缙教授协商以赵先生《谈杜甫的秦州诗》为拙著代序的缘故，看到了这个书名。末了，他很婉转地提议——那个“两可斋”的标签是否可以去掉，还是去掉的好些。书稿到了出版社，王文琴编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个“两可斋”的标签还是去掉的好。末了，我比较愉快地撕掉了这个“标签”。书名成了《杜甫秦州诗臆解》。到了报选题的时候，专家组提出“臆解”的那个“臆”字容易引起歧义，且不怎么严肃，建议再改个名子。末了我在想不通之后又突然想通了，和甘肃教育出版社薛英昭副总编一道推敲，将那个“臆”字换成了“别”字。书名最终成了《杜甫秦州诗别解》。现在看来这还真是一个既别致又求实的书名，我也喜欢。旧名、新名比较，前者如果是“领异标新二月花”，那么后者便是“删繁就简三秋树”。现在看来还是质实朴素的好。

说明了书名的“名”，再来解释一番缘起、想法和做法方面的“实”。作为诗人，杜甫有幸有不幸。不幸者，诗作在本朝并未受到额外的重视，而且散佚过半；有幸者，北宋之后，诗史、诗圣地位确立，光焰万丈，与时俱隆，至于新社会还荣获世界文化名人桂冠。北宋之后，注杜诗者即有“千家”、“百家”名目，且流韵延绵不绝。张忠纲先生等主编的《杜集叙录》收书1261种，其大多数系注解之作，有人将众多的易学著作称“周易之河”，以此比附，历代注杜的著作可称为“杜诗之河”。或曰，大家名家都注了千年之上，有必要由你这无名鼠辈涂鸦乱注之？不然！不然！名家固然名、固然大，而就所注秦州诗来看，不解风土人情乱注者有之，不知历史文化背景附会者有之，引经据典离题

万里者有之，陈陈相因拾人牙慧者有之……于是乎注解远未尽善尽美，我辈仍需再注之。有道是“叫花子打算盘，穷有穷打算”。当然啦，注杜诗谈何容易，开始作注时我有一种欣然赴死的感觉，注杜诗——找死！不过，秦州诗就诞生在我诞生的地域，我编过十六年的地方志，对本地的历史地理、山川风物还有所了解，于是乎幻想着敢于找死还不至于死的侥幸，大胆作注，注了杜甫的秦州诗。意欲为“杜诗之河”添上一滴或两滴水滴。求真务实的大旗在面前高扬，理当奋然前行。或曰，你注，你能注出个啥样子特点？我想着，注释嘛，不论以什么面目出现，解决问题的那种注释才是好注释。要说拙著的特点，最突出的有四条：一、别人注清楚的，原文照录或一笔带过，没注清楚的详考之，详注之，至而有些注考释得不像注释了；二、特别注重揭示诗句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解决何而有这样说法的问题；三、详注名物如动植物、如乐器等，以弥补历来注杜者得过且过之失；四、不拘一格，或“释意”，或“相关链接”，或“讨论”，一切以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为要务。此注释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彼注释，看了就知道。但愿不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再序些什么呢？算了吧，我似乎感到杜老先生在窗外天空中的某个位置看着我微笑，笑我生吞活剥？他老人家，笑……我突然想到，分一杯老先生潦倒新停的浊酒，对酒而歌，对酒而泣，月光下，松林间，高山流水。突然想到穿越时空追随杜老先生去流浪，以追随他那颗博爱而忧郁的心思。静夜，我来敲你的门，你在无？拨一拨你紧锁在诗歌深处的情景，期待迷雾中流露出鲜明的晨光。

刘雁翔

2011年8月18日序于两可斋

2012年4月27日修订于两可斋



注释做完了，总觉着还应有一个综合性的总结之类东西放在前边，以利于对秦州诗的总体把握，但总理不出个清晰的线条，那就乱说、杂谈一气吧！

一、来秦之由和去秦之由

关于杜甫西来秦州的原因，他本人在秦州诗中有所交代，《秦州杂诗》其一说：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又，《秦州杂诗》（其二十）说：

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如。

又，《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说：

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

综合起来，我们能得到的相关信息有这么两条：其一，社会动荡，生活困顿；其二，不得重用，心情郁闷。但，杜甫可是有职务在身的，好歹也是个小领导，为何就采取极端行为，辞官不做，因人远游流浪天涯呢？不做官难道就可以生活不困顿了吗？诗人的这些“自述”显然还不足以解释这么些个疑问，于是就有了研杜者多种多样的猜解。关于猜解情形，后面《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相关注释中将罗列，兹不赘言。我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勋成先生的观点，杜甫辞官是因为唐代的职官制度使然，既不是主动地辞，也不是被动地罢，而是杜甫华州司功参军